

民意调查：一个有待开拓的社会学新领域

陆 震

作为社会调查的一个内容和一种方法，民意调查正日益引起政府机关、科研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至学校、农村等各处的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改革、科学研究、工商业经营、农村建设、学校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等不同领域。然而，与对民意调查的热心运用相比较，人们对民意调查的科学运用及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仍尚待起步。此种情形，虽属难免，总不宜拖延过久。为此，笔者不揣冒昧，将自己在思考民意调查现象时所得的若干浅见，叙述如下。

一、古老而崭新的现象

“民意”，与“民心”、“公意”等词语同义，指称人民的共同意见和愿望。对这种意见和愿望的征询、了解和分析，即是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并不是近代才有的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的原始民主制同时诞生，并且是这一民主制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所在。在我国，“民意”一词早就见诸史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臣乘马》中即有“怨民心伤民意”之语，《汉书·杜周传》中亦有“顺天心说民意”之言。而远在“民意”一词出现之前，人们就已十分重视民意，就在慎重其事地进行民意调查了。以下事实人所公认：在人类社会早期以氏族为生存单位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就任何事关氏族大局的公务召开氏族成员会议，征询全体成员的意见，是一切氏族共有的通则与惯例。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及由此而形成的原始的平等观念和对氏族集体、氏族成员的信赖、尊重，加之氏族范围的狭小，促成了以全民的民意调查为基本形式且唯民意是从的原始民主制的建立。我们把这种表现为一种民主制度的早期民意调查，称为原始民意调查。显然，它有以下特点：（1）民意具有裁决一切的至尊地位；（2）进行的是直接的民意调查，即直接征询人们对事项的态度；（3）以全民的民意调查为基本形式；（4）调查是以口头方式进行。

长达2、3百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漫长历程，使以原始民意调查为核心的民主制，取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而又伦理化了的历史惯性力。对民意的尊重，对民意调查的重视，成为深深植根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历史心理积淀和习惯行为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相沿成例，以至在进入阶级社会很久之后，统治者们仍被那逝去的文明所制约着、规范着。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习惯性地说着看重民意的话，做着民意调查的事。此类情形，我国先秦典籍中载录甚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盘庚》有“恭承民命”之言，《召诰》有“顾畏民彝”之语。所谓“民曹所好，鲜其不济也。民曹所恶，鲜其不废也”（《国语·周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其对民意的重视，可见一斑。以民意调查而言，《尚书·周官》：“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左传》：“晋惠公为俘于秦，使吕飴甥朝国人，……告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又：“周王子朝之难，晋侯使士景伯蒞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此为询立君之例。《左传》：“卫灵公将叛晋，朝国人问焉”，“吴之入楚也，陈怀公朝国人问焉”。此为询国危之例。盘庚将迁殷，“命众悉至于庭”（《尚书》），太王将迁岐，“属其耆老而告之”（《孟子》），则为询国迁之例。三询而外，何休的《春秋公羊传》中还记述了周王朝派人到民间采访诗歌，以测民意：“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班固以为此“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就是说，是为了了解民意，考察政治得失，巩固自己的统治，当然这里进行的已是间接的民意调查。此外，还有类似今日种种舆论机关的“史载书，瞽陈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左传》），统治者可借以观测民意。古代社会中看重民意和民意调查的光辉典范，自然要推城邦制度下的希腊奴隶民主制。这一制度之下，在属于奴隶主阶级的公民内部，颇有氏族民主的一代遗风，那个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即是显例之一。然而这一切，也仅是遗风而已，氏族民主制度的本质早已蜕变，民意与民意调查日益下降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掩盖阶级压迫的饰物。随着以不把人当人来对待为根本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普遍建立，民意的地位一落千丈，民意调查一事鲜为人言。拿中国古代状况来说，几个清官查察民瘼，若干官员微服私访，间或有钦差、巡抚大人按视一方，可说是封建制度下民意调查的全部内容。那些调查的结果则是统治阶级用以改善、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可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民意调查，是一种日渐衰微的社会现象，我们将其称为古代民意调查。作为原始民意调查的反题，它具有如下特点：（1）民意贬降为统治者政治权力的附庸；（2）民意调查成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手段和仁政点缀物；（3）民意调查的精神背景已不再是平等观念，而是基于对民众的利用、治理和对人民力量的恐惧等统治心理，所谓“载舟复舟”的议论，堪称这类心理的写照；（4）除了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和一些别的少数例外，极少有全民的民意调查。此外，除口头方式外，古代民意调查有了文字方式的调查。在进行直接的民意调查时，也使用间接的调查方法，即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和所言所行去探求民意。最后，与原始民意调查一样，它使用的也是直观的经验调查方法。

现代民意调查兴起于资本主义制度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际。将现代民意调查等同于今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民意测验，这是人们相当普遍的一个误解。民意测验仅是现代民意调查的方法之一，它迟至19世纪20年代方始出现。现代民意调查则开端于统计学的问世并以统计学为基础，在技术和科学性上较直观经验的原始民意调查和古代民意调查进了一大步。1671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写成《政治算术》一书。随着这部标志社会经济统计学诞生的著作的出版，在英、法、德、荷兰、瑞典等国家出现了一批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现各种观点和各种命题的社会调查方面的书籍，其中既有直接的民意调查，也有间接的民意调查。这样，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得力于统计学的推助，古来就有的民意调查得到了复兴，跨入了现代民意调查的新阶段。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继拉普拉斯之后，著名的法国——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将概率论运用于社会经济统计学，开创了数理统计学的新领域，为现代民意调查提供了又一个科学技术方法。在这些新技术方法的基础上，英、

法、德等国的政府、慈善组织及一些个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包括民意调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英国统计学家布思的三卷本著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89—1891），包括了反映伦敦四百万居民日常劳动、生活及其意愿的大量资料。法国学者勒·普累六卷本的《欧洲工人》（1877—1879），“不仅研究每个家庭物质生活的细节，而且研究他们的感情、激情以及一般的理性生活和道德生活”（库恩：《19世纪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35页）。德国学者列文斯坦的《劳工问题》（1912）一书，作为20世纪初对工业劳动的最广泛的研究，通过对一系列涉及工人生活的重要问题的调查，在包括工人的动机、满足、爱好及对自己状况的一般态度、愿望与要求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

在上述将民意调查作为社会调查的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合在一起进行的同时，19世纪初，在美国出现了专以民意调查为目的的民意测验。据目前所知，最早的民意测验由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和《明星报》于1829年举行，在公众中作小范围抽样调查，征询人们对消费品和新闻媒介工具的态度，带有市场调查的性质。19世纪末，这一方式逐渐被人重视，测验的范围由地方扩展到全国。本世纪起，民意测验的内容从市场调查扩大到总统选举、社会问题、政党斗争等方面。进行民意测验的部门，由新闻界发展到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军队和各种社会团体。自1936年盖洛普的“美国舆论研究所”在总统选举中预测成功之后，它所使用的抽样调查方法，开始成为民意测验的标准程序，民意测验由此作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的调查方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大量的民意测验机构纷纷建立，许多专门报刊先后出版，一些主要的大学都设立了舆论调查中心，并在欧洲、大洋洲成立了美国舆论调查所的分支机构，经常在50多个国家举办民意测验，研究国际舆论。1946年，“美国全国舆论调查中心”开会，探讨了民意调查在地方、全国以及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并就抽样、意见征询表的填写及调查结果的整理、资料的可靠性等问题交流了经验，推动了民意测验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二次大战后，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也建立了民意测验组织。1970年，民意测验的世界协会已在41个国家拥有300个会员。随着统计理论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民意测验的程序和手段日趋先进，愈来愈多地被世界各国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各领域。借助于民意测验，现代民意调查已成为今日国际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此外，现代民意调查还包括诸如选举、公民投票与公民复决等公众裁决的方式。选举制度肇始于中世纪自治城市议会的产生规则，今天，它通行于世界各国，是一种制度化了、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法定民意调查。公民投票，亦称全民投票、全民公决，指由全国公民通过直接投票决定国家大事。这一直接民主的形式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平民表决，以至更久远的氏族民主制的全民表决。它通常在国家政局发生变化或决定重大事件时用以征询民意，确定是否批准某项法律、政策、政治制度、国家领土的变更、国家独立等重大决定。在国际关系中，有时用以决定某块领土的归属问题。公民投票既包括立法机关在通过法案或决意之前对民意的调查，也包括立法机关在通过法案或决议之后对民意的征询即进行公民复决。在一般情况下，公民复决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意义。公民投票普遍存在于各代议制资产阶级国家，在个别国家如瑞士，甚至占有统治地位。

现代民意调查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植根于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功利主义追求，也出于人类了解和管理社会这一科学认识上的需要。它既是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丑恶统治的斗争产物，也是人类理性觉醒、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结果。它既依赖于由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对民意的重视，也立足于现代科技方法与物质手段。1671年以来的三百多年

历程表明，现代民意调查：（1）它不象古代民意调查那样是一种逝去了的文明的模仿物，而是创造新文明的起始阶段的一个部分，它更多地受理性认识的清醒指导，而不是基于习惯行为方式。在中世纪跌入谷底的民意的地位在逐步上升，这一上升，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意调查中，已升居了主宰社会事务的尊位。在这里，“指挥一切的是普通的小百姓”，国家“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天性”；^①（2）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字调查、直接民意调查和全民民意调查的方法；（3）进行民意调查的团体、部门急剧增加，应用范围越来越广；（4）调查方法优于传统的民意调查方法即经验调查方法，但并不排斥后者，而与后者相辅相成，同时使用；（5）调查工作制度化、法律化，调查的物质手段现代化，调查操作程序化，调查结果快速化、精确化，调查研究趋向学科化。特别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并存着两种阶级本质截然相反的民意调查类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意调查和无产阶级的民意调查（始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意调查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意调查（始于苏联十月革命）。

二、历久不息、日见其盛的原因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许多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多少璀灿的古代文明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然而与氏族同时诞生的民意调查，非但未随着氏族的消亡而绝灭，相反它历久不息，近代以来，更日见其新、日见其盛，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民意调查之所以能如此久存于世，极富生机，其原因又何在？

（一）民意在社会运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简而言之，其一，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社会活动，归根结底总是民众思想和愿望的反映。民意乃是各种政策、制度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意识前提。其二，民意的向背是社会政治斗争、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等等警句，即此谓之。在生产力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的可能范围内，民意将最终决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形式以至性质，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与进程。其三，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定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民众主体作用的不断增强，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它必然导致民意地位的步步上升，较过去更清楚地显示出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侮、不可抗的真理。其四，民意是指示各种社会情况所处状态的晴雨表和衡量一切社会政策的试金石，即所谓“人心自有公论”。恩格斯曾指出过，人民几乎能从本能上感觉到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从而表示出欢迎还是反抗的情绪。^②

此外，民意尚有如下特点：一是民意作为民众共有的社会态度，既可能以高层次的理性认识为基础，也可能基于低层次的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既可能出于信念、信仰，也可能源于各种实际利益的考虑。因此它除了深沉、稳固的一面外，还有多变和易被激发的一面。由于民意对社会变化总是十分敏感并能迅速作出反应，就使多变、易激发的一面更为复杂。二是民意的承受力强弱没有确定的限度，它随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可大可小，有很大的升降幅度。三是民意不同于个人的幻想或非非之念，它总是现实的，是生长于实际生活的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倾向，并会顽强地、难以阻抑地转化为公众的行动，产生相应的社会

^①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43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2—163页。

后果,情绪一来,可以建设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不能把握民意,在它的力量、变化与后果面前,将陷于盲目应付的被动地位。

(二) 它能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和历史上民意的调查、分析,指示民意的真实情况及其变化规律这一特定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律。同时,作为一种信息反馈,民意调查具体展示人心的向背,为良好的社会运转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监控手段和检验工具。民意调查的这一功利作用,最为政府部门、工商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重视。第三,民意调查是一种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的凝聚工作,它征询而得的民意主流,具有巨大的舆论引导力量,其对社会成员的从众心理所具有的权威性与感召力,不是一般单个人的意见可比拟的。它能调节人们的社会心理,修正人们的社会观念,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第四,物质生产中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及由此而来的各国间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使对他国的民意调查越发变得重要。外交、外贸、文化交流,无不以对对方国家民情民意的了解为前提。对于一个处于改革、开放中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第五,民意调查又是一种重要的科研方法。它能提供大量科学的数据,为人们定量地进行定性研究创造条件。同时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推动争鸣的手段:人们可通过民意调查,将是非曲直的判断诉诸于社会和群众,由他们基于实践作出检验,存优汰劣,及时纠正错谬;发展真理。民意调查甚至还是一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的重大制约因素,例如生态学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人工授精、安乐死等领域的状况与进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意调查及其所得的结果是“众誉”还是“众怒”。第六,民意调查的实践,能多方面地提高人的文明素养。它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尊重他人、尊重集体、尊重社会,增进人的公德心、公益心、自谦心、友爱情感和宽容精神,培养人的思考能力和独立品格,增强人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个性。

上述诸种功用之外,以现代统计理论和计算机运算为基础的民意调查,还具有准确性高、速度快、操作程序化、规范化,因而简单易学,省时省钱省力,应用范围广泛等许多优点。就准确性说,英、美等国的主要民意测验机构进行的选举预测,除了在1948年和1970年各错报过一次外,其余各次都正确预报了大选的结果。以省时省钱省力言,象美国这样一个2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进行全国性民意测验,只要抽取1500到3000人作为样本即可,误差率不会大于3—4%。就应用范围之广讲,民意调查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活动领域,如在匈牙利,专门负责进行民意测验的大众传播研究所,就从政治经济体制到消费品、商标等问题,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作民意调查。因而,上述民意调查的种种功用和优点,形成了它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持久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 任何社会都需要安定和谐的社会内外部发展环境,而这是以对民意的洞悉为前提的。没有民意的安宁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定。民意是否安宁,怎样才能安宁,都需通过调查方可了解。波兰在1970、1976、1980年都曾因未作慎重的民意调查就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导致工人大规模罢工,社会严重动乱。去年一月,在未作必要的民意调查的情况下,又贸然行事,实行了工人们称之为“官僚主义方式”的食品大涨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险些又一次酿成祸乱。最后,以撤消涨价、处罚涨价事项的决策者完事。也许可以说,进行民意调查是确保天下太平的首要条件之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切社会活动的管理,就是对作为活动主体的民众意愿的了解,按照民意去组织社会生活,调节社会运转,与民意啮合的社会管理将导致社会的良性运行。基于此,现代社会日甚一日地把民意调查作为管理程序中

的必要环节，无论在决策还是对政策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和检验，都将调查所得的民意状况作为重要依据和指示器。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一靠政策的正确，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这两条都是通过民意调查这个中介才能办到的事情。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要依民意改进社会管理的制度和政策，而且也要“依民意选出和更换”而不是“经过官僚手续”决定国家和政府官员的人选，^①以此完善社会的管理机关。第三，社会发展政治民主需要民意调查。民意调查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或民主手段，它成为人民用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参政方式。这一参政方式的实践过程，将使全体社会成员在观念上、行为模式上、伦理意识上及心理定势上，逐渐养成民主决策、民主生活、民意是从等民主习惯，逐步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民对立为真正的官民分工、官仆民主。第四，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民意调查。人心思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计划，必须以本国国情为基础。而人民的致富意愿，他们对致富方式的选择，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对国家的要求和希望，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产生和存在的种种情绪等等，都是国情的组成部分。

(四) 如果说原始的民意调查是基于氏族生活需要这一感性经验，古代的民意调查主要是迫于某种社会需要而进行的被动行为，那么近代以来的民意调查则含有日益增多的理性自然成分，表现为目的明确的主动社会活动。这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当然也是人民斗争的产物。这一进展，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领域，将民意调查作为一种必经的程序乃至法定的程序。是否进行民意调查，对民意的顺逆，已不只是功利问题，它们正日益成为法律问题和道义问题。

(五)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民意调查得以广泛开展的关键性原因。没有社会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的理论，没有现代的计算技术，没有电子计算机等现代信息通讯和运算设备，就不会有现代民意调查。仅有经验调查手段的人们，不论他们对民意、民意调查有如何高深的理论认识，以及有怎样虔诚的作好民意调查的愿望，也无法在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深深制约着民意调查的进展状况，并从这一个侧面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作了以上考察之后，民意调查的历久不息，日见其盛，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我们断言，在现代世界的竞争潮流中，谁对事关社会诸现象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民意调查有更深入的研究、更高明的运用，谁就能在竞争中更多地得分，那决不会是夸大其辞了。

三、有待开拓的社会学领域

作为社会管理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民意调查正被世界各处的人们频频使用着，发达国家的民意测验已经学科化。民意测验世界协会拥有的会员多达300个。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来情况也早已有了变化。如匈牙利，在1968年建立的大众传播研究所，是一个专门的民意测验机构，目前有调查员300名，每年进行40次大的调查，50次快速民意测验，每周进行一次电视观众调查，工作相当活跃。1985年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除常规调查外，还根据党的中央委员会属下的任何一个部门的要求进行民意测验。匈牙利的市场研究所是另一个民意调查机构，每年进行150次民意调查，征询消费者关于商品、销售、广告等问题的意见。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85页。

波兰从1981起,也建立了民意测验机构。民主德国和苏联现今尚未有民意调查机构,但都在甚有兴趣地进行民意测验。看来,它们建立专业民意调查机构不会是久远之事。我国是10亿人口的大国,不论民意的指向为何,一经启动,人多势众,惯力特别强大,非那些小国和中等程度的国家可比。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运行节奏,人们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联系日趋密切,这一切,加上高技术条件所提供的物质手段,使得每一个社会局部的民意具有越来越大的力量,对社会整体有着空前强烈的制约作用。在目前“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对民意的科学了解显得更为重要。

可喜的是,近几年先后在各个领域开展的民意调查活动所汇成的潮流,终于冲决了视民意调查为资产阶级专利品的藩篱,开了社会调查的新生面。但是对民意调查的轻视、鄙视以至恐惧,对民意调查的崇拜、猎奇态度等仍然存在于不同层次的人们中间。

实际上,无产阶级的民意调查早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创。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前后,也都极为重视民意调查,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社会调查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民意调查优良传统的根本体现和精辟概括。我们再不可因名害实,鄙视与惧怕民意调查。也不应在精确度日益提高的现代民意调查面前,再安于“大多数”、“极少数”这种含混其辞、例行公事的老套套、车轱辘话。在现代社会,凡涉及国家大局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而仅凭“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是“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的”。^①

而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逐步将社会统计之一的民意统计制度化,作为各级政府和领导部门作决策论证时的必经程序和必要依据。各级政府与领导部门的工作报告、政情报告,必须把最基本的社会情势、社会问题、社会政策所作的民意调查,作为重要内容。在依法进行的社会经济的常规统计中,民意调查情况或者说“民意统计”应是法定项目之一,等等。这将使民意调查得到法律的保障与推动,较快地成为一种惯例,并在全社会较快较顺利地形成重视民意调查的制度心理。

到这里,已经很自然地提出了民意调查的学科化的问题。因为真实、及时、科学,是民意调查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它取信于人、具有权威力量和能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不具备这三个要件的民意调查,不但是无效劳动,而且有害于社会。因此,无论在调查的时机上、内容上,在调查方案的设计上、实际调查过程的组织操作上和调查结果的分析上,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专门的技术以操作。

目前我国作民意调查工作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不在少数,几乎遍及政府部门和各大行业,并且部分地运用了计算机和统计手段,有了不少众人信服的调查成果,出现了向科学化推进的趋势。与此不相称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也没有专业的民意调查人员。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意调查发展的经验,建立专门的机构和设立专业的调查和研究人員,对于保证和提高民意调查的科学性和高水准,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学应开拓的领域。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深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420页。